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胡阿祥 著

中国名号 与中古地理探索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013055140

D691.2
91

大学史学丛书
八学人文基金项目

明阿祥 著

中国名号 与中古地理探索



D691.2
91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胡阿祥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70-8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国号—研究—中国—古代②古地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D691.2②P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520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藪。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 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 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 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棣、刘

①《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中国名号篇

“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及其意义	3
“中国”名号考述	8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述论	31
答《夏国号再议》	44
嬴秦国号考说——兼说秦置秣陵无贬义	57
源远流长“汉”国号——附议陈寿《三国志》之《蜀书》名义问题	68
王莽新国号述论	86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96
赵宋国号考说	103
蒋山、蒋州、蒋王庙与蒋子文崇拜	112
乌衣巷名称的由来与乌衣国的传说	119
《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	126

中古地理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	141
魏晋文学地理论纲	154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173

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	191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	205
东晋南朝双头州郡考论	250
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徕郡僚郡述论	266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人口迁徙及其影响述论	284
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	309
后记	348

中国名号篇

“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及其意义

一

人有姓名,国有称谓。所谓“中国”古今称谓,指的是由古迄今“中国”这一区域的称谓,包括自称与他称。在地名学上,这些称谓属于面状地名,即“中国”这个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是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史、文化史、地名学的重要课题。

有着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古今称谓繁多而又可大别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包括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曌的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计十四个统一王朝国号,^①以及帝制结束后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号的指称对象,无论时间抑或空间,都相当明确。第二类可拟称为名号,如区夏、有夏、时夏、诸夏、中夏、函夏、方夏,华、诸华、华夏、华域、华壤,中国、中华、中土、中邦、中区、中域、中畿、中县、中州,禹迹、禹域、禹甸、禹县,九州、九有、九圉、九原、九土、九围、九牧、九畿、九域、九方、九隅、九区、九野、九壤、九宇,四海、四方、四表、四封,海内,天下,赤县神州、齐州、冀州,汉地、汉域,神国,宇县、宇内、域中、封域、区县,方畿、方内,东土、东国,等等皆是;名号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涵义也往往多变。第三类是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者,除了汉、唐、中国、中华这些源于国号、名号的称谓外,还另有支那(China,或译真丹、震旦等)、赛里斯(Serice,或译舍里斯、赛里丝等)、桃花石(Taugas,或译陶格司、汤姆格

^① 元的国号,“大元”是全称,“元”是简称;又“明”、“清”也是简称,“大明”、“大清”才是正式的全称。国号加“大”字,始于元朝;以前各朝的“大”字,则系尊称。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

芟等)、契丹(Cathay,或译乞塔、契泰、迦太等)四个系列,以及诸如那迦(Nagas)、德卢(Ta-ruk)、德由(Ta-yuk)等特殊称谓;其原型大体不是汉文,而是各种外文的音译。

“中国”古今称谓如此之多,然而也许是对其中的有些称谓太耳熟能详了,而对另一些称谓又太过于陌生,有关“中国”古今称谓的推源释意研究、系统全面探讨,竟然还尚待展开。这种情况,可以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释名》。昔刘熙撰《释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故《释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国”古今称谓言,也与此相仿佛。笔者长期任教于大学,在课堂上,常常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启为什么用夏作为国号?刘邦为什么定国号为汉?时时接于目、闻于耳的华夏、中国、中华又是什么意思?”让人感叹的是,如此等等的相关问题,大学生、研究生们往往哑口结舌或者语焉不详。这是滑稽的。我们的祖先生长在中国,我们生长在中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国,而作为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称谓岂能不知,岂能不解!本来,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历来就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如此,国家称谓亦然!考究中国历代的国号、名号,了解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实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

“中国”古今称谓的产生原因极为复杂。如国号,从最早的夏国号到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其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从字面义看,中国历代国号大多具有美义,属于“美号”,这些“美号”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的心理要求,进而使政权蒙上了顺天应人的色彩。又如众多的名号,它们或与民族相关,或与文化有缘,或联系着历史传说,或根源于地理观念,至于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等等,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涵义的变化。再如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是域外人或外国人给起的,而所以要起这些称谓,则联系着国号翻译原则、国号命名方法、国号心理、国际关系、地理视野、中外交通形势、民族更替等多方面因素。

深入探讨“中国”古今称谓的政治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

“伟矣哉！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的中国古今名号，来源不一而又终归取准于文化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①

就国号言，首先，早在前21世纪，启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启用作国号的“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的美义有关；而取美义为国号，遂成为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不仅是中原王朝，而且是中央王朝，即统一范围较大，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当时“天下”统治地位，又统一程度较高的王朝。这样的王朝所使用的国号，地位远居其他国号之上，影响远较其他国号广泛、持久，它们是中国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它们可以作为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其次，从夏、商、周以迄大明、大清，国号一直是家天下即某一姓帝王家族拥有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标志，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于夏为蝉，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于新为“应天作新王”，于晋为巍巍而高，于唐为道德至大，于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于大元为“大哉乾元”，于大明为“光明所照”，于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皆为“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的“美号”。至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即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第三，“伟矣哉”国号还体现在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之用汉式国号，及与前代中原王朝攀附关系。如十六国北朝之匈奴刘渊、巴氏李寿汉国，匈奴刘勃勃之夏国，鲜卑拓跋氏之魏国，鲜卑宇文部之周国，五代时沙陀部所建唐、晋、汉国，以及契丹之辽、党项之夏、女真之金，乃至蒙古之大元、满洲之大清。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些国号表明了非汉民族决不自外于中国，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

就名号言，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即以文化概念的中国言，所谓“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凡文化上达此标准者，即为中国；文化既不断进步，中国的地域范围遂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增多。那些非汉民族政权或国家，

^① 拙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本文即据《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写成，有关论述详见书中，皆不予展开。

随着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不仅从文化上、也从地域上成为了中国的一分子,因此中国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国,既与地域概念的中国、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辅相成,又较之更加客观与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国,无论时间、空间都指称相当明确(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地域范围,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由中国概念的流变,我们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史实,同样非常明确地显示于诸夏、华夏、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等等悠长而响亮的名号中。这众多的自称名号,出现时间多在先秦时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古今名号的伟大之处,是在这些名号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中国地域也由灰小而广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以文化成!中国者,文化之中国!

再就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言,有源于秦王国国号的支那系,源于神秘精美的丝的赛里斯系,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的桃花石系,源于民族的契丹系,源于国号及名号但更与文化有关的汉、唐、中国、中华系。然则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演变脉络可谓相当清晰,即大体由国号而物产,由称号而民族,最后取准于文化;又就这些称谓流行的地域看,大体为连成一体的亚欧非大陆及东亚、东南亚海邻诸国。而诸如此类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反映出,长期以来,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至心态文明,影响超越了中国本身的时空范围,广泛地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如赛里斯称谓,源于产自中国的各种各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织物,外国人对之不可思议,于是以物名国,称中国为赛里斯;又如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祚运长久,国势强大,声教远暨,对周围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域外于是常称中国为汉、为唐。

当然,研讨“中国”古今称谓,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传统名号文化中一些沉重的方面。比如受悠久且深厚的名号情结的作用,汉武帝、隋炀帝、明成祖、慈禧太后等等之炫耀国力,粉饰盛世;比如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观念里,视蛮夷戎狄为“居天地之偏”,无“礼乐教化”,并因此视利玛窦的《山海輿地全图》为“全属无谓”,拒绝接受新的世界观念;又比如大清国可悲地以“中国”作为精神慰藉,作为鸦片战争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一种心理补偿。然而诸如此类的方面,虽然沉重,却颇能引发

思考。若近现代中日之间有关“支那”之争：“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对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有过什么非难与不满，而所以嫌恶日本人口中的支那，那是由于旧时代高傲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时至今日，支那这个名词已在日语中消失，再也不能成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实是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强大的新中国，使得日本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看法。”^①再若域外称呼中国，由“睡狮”到“醒狮”，再到“雄狮”，由“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此“正形象化地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所走过的那一条觉醒、奋斗、成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②无疑，这期间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三

揭示“中国”古今称谓的来源与含义，厘清各别称谓的使用时间与指称空间，意义非凡：其一，“中国”古今国号、名号以及域外称谓，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往往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故深探其源，细释其意，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更加热爱我们历史悠久、文明发达、民族众多、疆域广袤的伟大祖国。其二，有助于澄清中外广大的社会各阶层对相关问题的模糊认识。“中国”、“中华”等名号及“支那”等称谓的定位和解释，事关国家、民族以及国际关系的大体。而现实存在的情况是，许多人对于这些概念有着诸多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外族所统的大耻辱，有人至今仍极端地认为只有汉族建立的王朝才可以称为中国；至于小部分人的居心混淆，大部分人的认识模糊以至无可奈何地选择回避和漠视，同样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这些，都既不利于国家的进步，也有碍民族的团结。其三，“中国”古今称谓的复杂演变，还从独特的侧面，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中重视、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淋漓尽现了方块汉字的魅力、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国气度。

（原载《中国地名》2003年第5期，题为“‘中国’古今称谓探微”）

① 拙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第343页。

② 拙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第382页。

“中国”名号考述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在这里,中国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简称就是中国。

按中国一词,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然而,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从夏、商、周直到大明、大清,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什么含义呢?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跨古今、括全域的通称的?在文化上都有些什么象征意义?“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考证,予以梳理。^①

一、释“中”释“国”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口,丨下上通也。”段玉裁《注》:“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就古文字来说,中国、中间之中本应作,在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

^① 本文所考述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详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第3章之“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的界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谭其骧先生居功至伟,这也是谭先生对国家、对学术的重大贡献之一。值此谭其骧先生九十冥诞之际,因特撰此文,以志纪念。又本文旨在用有限的篇幅,简单而又系统地梳理由古迄今“中国”这一名号涵义的流变,故于代表性论著如陈登原著《国名疏故》(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1981年),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多有参考,每有引述。

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对此,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说:

甲骨文的字本象有旒之旗,商王有事,立以招集士众,士众围绕在旒之周围以听命,故字又引伸为间之。甲骨文的“王作三师右左”,已用字为间之,这就是中国之中字本应作的由来。^①

由中间之中,又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说文解字》释“中”为“内”,又释“内”为“入”。段玉裁则发挥之:“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段说甚是。盖中,“中央四方之中也”,^②“中有定名而无定位”,“随地而各不同”,^③即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乃对外而言,乃别偏而言。然则中的涵义,又不独仅此,在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④故古人视中尤重。就为政而言,要“允执其中”,^⑤“用其中于民”;^⑥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⑦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⑧古人论道,也以中为归旨:“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⑨以此,则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

中既具备了上述美义,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文化名人夏丏尊《误用的并存与折中》略说:

① 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东京:文求堂,1914年)、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略同。“中”字本义,又有日表说(姜亮夫:《“中”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演变之研究》,《杭州大学学报》第14卷增刊,1984年)、建鼓说(田树生:《释中》,《殷都学刊》1991年第2期)、神杆说(萧兵:《“中”源神杆说》,《中国文化》第9期,1993年秋季号)等,不赘。因为“中”引申为“中间之中”,各家并无异议。

② 《汉书·律历志》。

③ 家铉翁:《则堂集》卷一《中斋记》,卷三《中庵说》。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中庸说》。

⑤ 《论语·尧曰》。

⑥ 《礼记·中庸》。

⑦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⑧ 《礼记·中庸》。

⑨ 《朱子文集》卷六七《已发未发说》。